

《道草》里“李鸿章的书(法)”的意义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胡兴荣

[摘要] 本文分析、考察了夏目漱石的小说《道草》的“契约”性质,时代背景及其作者的国家观念,阐明了《道草》的“契约”性质与其中“李鸿章的书”的关联性;“李鸿章的书”在《道草》里不是一个单纯的书法概念,而暗指“李鸿章”的条约书反映着作者一贯的国家观念,其意义在于唤起一种国家道义伦理。研究表明,《道草》不单是作者个人的传记,也是其家族的盛衰记,它体现了作者对人性的认识和生存的理解,主题在于时代。

[关键词] 夏目漱石 道草 契约伦理 李鸿章 道义

DOI:10.13508/j.cnki.jsr.2017.01.013

《道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二年,夏目漱石在《朝日新闻》上连载(1915年6-9月)的小说。在迄今为止百年多的岁月里,《道草》和作者的其他作品一样几乎被研究透了,而关于其中“李鸿章的书”却很少有人论及过。这大概是因为《道草》被认为是作者的自传性作品的缘故。《道草》是漱石唯一的一部取材于其自身生活经历的作品。作品以主人公健三留学归国那年(1902年)秋到翌年初两个多月为时间背景,以处理“十五六年前”就早已立约断绝养父子关系的养父又来要求恢复养父子关系的事件为主线,记述了作者伦敦留学学成回到东京的1903年前后到1909年养父事件解决的七、八年间的主要事件,并通过“记忆的探照灯”追溯了其三十多年的人生经历。《道草》也因此被认为是作者的自传性作品。值得深思的是,作品围绕养父毁约事件的解决,通过“血和肉以及历史”的脉络,记述了主人公健三家族三十多年间的婚姻家庭、家族社会等从口头承诺到“字据”证书等大量的“契约”关系反复,在记述这些“契约”关系反复时多次提及的“李鸿章的书”。从《道草》的“契约”反复性质、时代背景看,“李鸿章的书”在作品里看似只是一个书法概念,实暗指李鸿章的条

约书,反映了作者一贯的国家观念。能否理解“李鸿章的书”,这是一个关系到能否理解《道草》主题的重要问题。因此,本文将通过分析和考察《道草》的“契约”性质、时代背景,结合漱石的国家观念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1

契约是关于权利、义务关系的发生、变化当事者间的意见统一。广义上契约也包括债权、物权和身份法上的契约等。《道草》讲述了早已立约断绝养父子关系的养父岛田又来要求恢复养父子关系开始,到再立约断绝养父子关系结束的故事,所以,它首先是一部以处理收养关系“契约”反复为主线展开的作品。其次,作为阻止与岛田再交往的理由,健三的家人找出了断绝养父子关系时留下的“一捆”“两寸厚”的“字据”“契约”,其中除了与岛田的收养关系“契约”外,还夹杂了健三家族婚姻家庭、家族社会等关系的“字据”“契约”证书。这些“字据”“契约”不仅未能改变健三与岛田再交往的主意,反而勾起了健三三十多年间的回忆,又引出了内容涵盖婚姻、钱财、养子,形式包括

口头承诺到成文证书,关系涉及健三与其家人及其他人之间大量的“契约”关系,使《道草》构成了一部具有记述广义的“契约”关系反复性质的作品。现实生活中,人们把重要的“字据”放在一起保管也是自然的事,而《道草》把婚姻、钱财、养子等体现人生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归集为“契约”的表述不仅构成了该作品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也为读者从“契约”的角度来考察这一作品提供了一种可能。

不论内容、形式如何,契约实质上是对一个诺言或承诺的约束。不遵守诺言、不履行承诺就是一种毁约行为,所以,能否守约又归结于一个契约伦理问题。所谓契约伦理就是当事者在立约、履约、毁约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伦理性质及履约中所需的伦理基准。立约、履约必须基于一定的伦理准则才能实现,如诚信、公正、责任等。契约虽然只是一个形式,但契约伦理实际上也反映了当事者的生存伦理。所以,《道草》通过“契约”关系反复的表述实际上表现了一种生存伦理。《道草》是以健三处理其养父岛田毁约事件为主线展开的作品,岛田是如何毁约的,而健三又是怎样应对的,分析其过程可看出各自的生存伦理。从那捆“字据”可知,岛田收养健三也是因健三的生父曾收养过岛田五年。而岛田收养了健三五年后因外遇夫妻不和就抛弃了家,也抛弃了健三。随后其妻阿常也改嫁,八岁的健三被其生父接回。后因岛田以健三的户名借高利贷,到健三二十二岁时,其户籍被生父迁回。为此岛田要了抚养费,立约与健三断绝养父子关系。岛田当年抛弃了家意味着他撕毁了与其妻阿常的婚姻“契约”^[1],也撕毁了他收养健三的“契约”,这表明他是一个为自己的情欲而不顾恩义情分又毫无诚信和责任心的人;他中年以健三的户名借高利贷,断绝养父子关系时又要了抚养费,表明他是一个为金钱而不择手段又绝情绝义的人;而他晚年以年老无靠为由来找健三要求恢复养父子关系,又说明他是一个无视“契约”伦理,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人。对这样一个为了自己的欲望无视义理、人情的人,健三并没有听家人的劝告以断绝养父子关系“契约”拒绝,而是抑制着厌恶之情答应再与其交往,并确

信这是“正确方针”。在健三看来,岛田尽管一生“为极其低级的欲望而终日忙碌,为人齷齪”,却也不过是个只“想满足金钱上的欲望,而绞尽了与其欲望不相称的幼稚脑汁”的可怜虫;其“生来伦理上的不洁癖和金钱上的不洁癖”使他分不清真正的利害得失,结果只能是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再说他毕竟曾是自己的养父,自己不能忘恩负义。可见,健三的“正确方针”体现了一种情理兼顾的道义理念,也表明他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其实,岛田来找健三也是因为断绝养父子关系时健三给的一份“断绝关系后相互也决不能无情无义(不能不仁不义)”的“誓约”书,只是健三已不记得那份“誓约”书。这说明健三的“正确方针”并不是迫于那份“誓约”书,而是“誓约”书体现了其一贯的为人。也因此健三又给自己引来了大麻烦,构成了一部在健三看来毫无意义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消耗的《道草》。岛田一旦得手便贪得无厌地不断来打扰健三,不仅要钱的数额一次比一次多,还提出了恢复养父子关系的要求。“看样子这是要慢慢的逐步侵蚀我了。开始企图一举攻破而被我击退,这次是从外围步步逼近。太可恶了。”当健三意识到岛田的这一意图,实在无法忍受其贪婪的“侵蚀”时,决意与岛田断绝养父子关系。为此他又付了100日元与岛田立约断绝养父子关系,岛田还给了他那份“誓约”书。而当家人为之庆幸时,健三却说事情未必就此了结,岛田若想再找麻烦还会有其理由的;人的情念凭一张“契约”是很难约束的,自己给钱并不是为了买回那张如“废纸”一般的“誓约”书,而是出于好意。可见,在对待养父问题上,健三始终奉行了其“誓约”书的道义理念。可以说“不能无情无义(不能不仁不义)”是《道草》的主题,断绝关系是其道义欲的强烈体现,但同时也表明其道义还没有达到超越感情的绝对境界。这一点对养母也是一样的。养母当年抛下健三一走了之,而在健三成家立业时却来信诉说她抚养了健三五年的恩情希望有所回报,结果被健三回绝。她晚年找上门来每次只能得到健三“略表同情而缺乏真心”的5日元路费,而无法知道健三“如果这个可怜的老太太是个善人的话,我会为如此破

落的昔日的养母养老送终的”的真心。总之，健三对养父母伦理上憎恶，生理上同情；而其同情心又无法抑制其厌恶之情，使他难以做得合理合情。其实，包括健三与其养亲，《道草》共描述了五组收养关系，可以说收养关系是此作品反映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知道，收养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以抚养与赡养为交换条件的双务互利“契约”关系，而《道草》里的养父母均未能尽其抚养者的义务与责任，却要求养子女履行赡养父母义务。然而，万事总是利害得失相随的，且物质上的利害是一时的，而义理、人情的得失则是相对长久的。所以，他们也只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包括健三给他们零花钱时提及的值5日元的钱包，收养关系上，作品里“5”字的运用也体现了作者的这种心境。可见，作为作者养子经历作品化的《道草》，其收养“契约”关系不仅体现了作者诚信、公正的“契约”伦理，也体现了其为人情义相随的道义生存理念。

健三的家人反对健三与岛田交往表面上是为了健三，而实际上均出于各自的私心。“一捆字据”加“记忆的探照灯”，《道草》除了五组养子关系“契约”外，还记述了健三家族三十多年间十多组不幸的婚姻、几十个钱财等“契约”关系。在婚姻关系上，为自我情欲而不顾婚姻家庭的也不只是岛田，还有长太郎和比田等。长太郎因此曾两度离婚、比田虽未因此而离婚，实际上其婚姻也是形同虚设。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健三，尽管他也感到自己的婚姻很不幸，却能忍受痛苦，克服婚姻危机，维护着其家庭，尽力履行着其义务与责任。健三之所以能做到这样与其不幸的养子经历有关，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有坚实的婚姻“契约”伦理观念。在钱财关系上，《道草》里爽约的也不只是岛田，除健三以外所有的人几乎都难以避免。尽管如此，健三想起比田夫妇、兄长等人对他如口头禅般的诸多承诺都未能兑现也只是怨恨而已；就连门司的叔父借钱的“字据”、岳父诸多社会关系“签约”在他的意识中几乎成了有借无还、空头支票的代名词，可他也没有因此就把他们看作是“欺诈师”“缺德汉”。然而，爽约意味着缺失诚信，而以“契约”

损人利己毕竟属缺德行为。人无诚信或缺德就难以在社会上生存。人们用社会“契约”对人的伦理道德进行规范就是因为生存的经验告诉人们，只有保持诚信才是生存下去的必要“技巧”。所以，信守承诺是契约伦理的要求，更是人生存的必须。事实上，《道草》里那些失信、缺德的人在人生的末路上均呈现出了“颓废的影子”“凋落的颜色”，而在“契约”伦理上近乎于洁癖一般的健三就成了他们生活的“靠山”。因此，他们反对健三与岛田交往。而健三对所有的人伦理上憎恶，生理上同情。经济上并不宽裕的他也能信守自己的诺言和承诺去接济别人，甚至包括曾抛弃过自己的人，还凭自己的人格设法借钱救助因诚信危机而陷入绝境的岳父。总之，《道草》通过收养、婚姻、钱财等反映人生最基本的“契约”关系反复，一方面反映了一种私欲“侵蚀”伦理道德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通过健三对这种现实的对待，体现出了作者一种情义相随的道义生存理念。

这种理念反映了作者对人性的认识和人生的理解。包括健三的“誓约”书，《道草》里保存多年的“字据”“契约”被蛀蚀，有的内容已模糊不清，“不规则”的“蛀虫痕迹”先后在作品里出现了六次。显然，这些蛀虫“痕迹”寓意着人性自然的生存轨迹就像软体低级动物的痕迹一样是不定型、无规则的；流动性的人的欲念自然会“侵蚀”人为的“契约”规范、伦理道义。这可以说是作者对一种人性本质的认识。受叔本华非合理主义哲学的影响，漱石在其《文艺的哲学基础》里，曾把人的意志表述为“生存欲的盲动意志”；《文学论》^[2]里，漱石用西洋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理论解剖人对概念附着的情感时指出，人对本能的情感最强，对道义的情感最弱，所以“正义常屈从于实情”。这种本能、实情反映在以撰写《文学论》手稿为背景的《道草》里就是情欲、钱财欲等，实质上也是《道草》之前被称为“爱情三部曲”的《三四郎》到《心》里作者一直追究的“生存欲”“生活欲”。另一方面，漱石更是一个有强烈道义伦理欲的作家，他始终认为无视规范约束、缺失伦理道义的生存方式必然

会阻碍其生存,这可以说是漱石对人生的理解。他在《文艺与道德》里指出:“道理上尽管说文艺的根本目的不在于鼓吹德义心,但作品或纵或横免不了要是摄入一些能供德义批判的材料,给人以思考善恶正邪的刺激的话,又怎么能说二者没有关系呢?……我们作为人只要在世上生存,无论你怎样挣扎也不可能离开道德在伦理的圈外坦然活下去”^[3]。在《教育与文艺》里也指出:“任何文学都离不开伦理,至少应有能唤起渴望伦理的成分……不管怎样表现人的弱点,文学应让读者从这些弱点中产生厌恶感,心中萌生伦理性的要求。这是人心自然的需求,也是艺术的基本要求”^[4]。因而在漱石的作品里“意志的人”不光充溢着“生存欲”“生活欲”,同时还具有强烈的“道义欲”“德义心”。为了“德义心”漱石在其早期作品《虞美人草》里曾决意“杀”了极端自私功利的藤尾。从《三四郎》到《心》的主人公们虽然“意志的人”的“道义欲”输给了“自然的儿”的“生活欲”,但《心》的“先生”最终还是选择了自杀。“先生”曾说“在金钱面前,再好的人也会立刻成为坏人”,“金钱上我对人类充满了不信,但在爱情上还未曾怀疑过人”。可结果是他自己在恋爱上也成了罪人。能意识到罪恶的人无疑是有“道义欲”“德义心”,有良心、能反省的人。不过,“先生”只是明治“高等游民”的一个典型,《心》的搁笔意味着“明治的终焉”。大正以来,东洋传统的伦理道德被认为已过时,取而代之的是西洋人性利己的合理化。因此,大正三年末,漱石在贵族子弟大学学习院讲演《我的个人主义》,提出了忠实自我的同时,要尊重他人存在的“道义上的个人主义”,他强调发挥个人主义的前提是伦理道德的人格修养。接下来的《道草》回忆的主要是作者写《文学论》^[5]初稿时的经历,实际上《道草》是把《文学论》等的理论和其后作者人生体验相结合,通过传记揭示人性自然本质,回顾、反省人生的作品。当然,《道草》的不少登场人物也不乏义理、人情,但这些都不过是东京下等市民流于形式的东西,支撑他们生存的本质上是“极端个人主义”伦理。自己不守约,却让别人履约;自己

无情义,竟要求别人讲情义。这是《道草》通过健三哀叹的“不合理”的普遍现象。作品每当叙述这种现象时总把根源归于“只有自己好”“只顾自己”“只要自己好就行”,这种自私而缺失他人意识又毫无反省的通性上。作者虽然也承认这是一种人性自然,但从观念上、人生经历感受上,就把它看作是一种“低级”软体动物的“幼稚脑汁”的“可怜虫”式生存方式,认定这种自我伦理的生存总归是不幸。因此,《道草》在空间上描述“不规则”的人性自然“侵蚀”“契约”的诸样态的同时,又通过三十年前后的“因果”对照对这种唯人性自然的生存方式作了否定。可以说“今昔之感”“自作自受”才是《道草》传记的意义。因而《道草》的惩罚者也就不像作者之前的作品那样是“意志的人”的“道义欲”,而多是时间上显现出的盛衰、情义等广义的“自然”。人性自然可“侵蚀”人为的“契约”规范,而在大的自然法则面前“所有的小聪明小手段,一切都是徒劳。”这是《道草》近结尾时作者通过健三发出的感慨。这里体现了作者的知性与修养,也显现出了漱石近“五十而知天命”之年“则天去私”思想的雏形。

江藤淳把《道草》与日本自然主义式私小说作对比时说,健三的伦理不过是漱石考虑出的在人的自然名目下,抹煞自己的过失,肯定自我的一种“外交手段”“日本式妥协”^[6]。而基于我们的考察《道草》在表现人性自然上体现了一视同仁的态度,但在伦理上健三与周围的人有着天壤之别。健三对周围的人伦理上憎恶,生理上同情,而其同情心里也包含了一种盛衰轮回的“悲观哲学”,这是周围的人们所没有的。可以说健三是作者在充满人性自然“生活欲”的环境中塑造出的一个有知性和“道义欲”的典型。当然,健三也有其人性自然的弱点,但其恪守诚信、追求道义伦理、厌恶不合理的人事、能自我关照的人格形象如鹤立鸡群般感染着读者的心。这与日本近代自然主义、私小说作家往往仅局限于一种自私、狭隘的自我伦理,缺失他人、社会视野,“无批判”“没理想”的“艺术”有着本质的区别。可以说江藤的所谓“日本式

妥协”与漱石无缘，却道出了日本近代思想的本质。因贪私欲而失道义，这可以说也是一种人性自然，问题在于使其合理化。漱石充分认识到这种自我人性自然的合理化必然会带来生存危机，尤其是它以国家意志的形式体现的时候。伊藤整说漱石是一个“人性认识者”^[7]，但同时又是一个“求道者”。而国家道义也是漱石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道草》里“李鸿章的书”就是其中一例。

2

“李鸿章的书”首次出现在《道草》46回，到49回“李鸿章”共出现了五次。45回，在健三回忆完那捆“字据”“契约”，概观了相关人物的人生困境，在对一青年介绍了法国哲学家关于记忆的新学说^[8]后写道：“健三并不是那种把自己置于一刹那间回想自己过去全部经历的危险境地时，才考虑现在的自己程度的傻瓜。”46回，岛田欲与健三恢复养父子关系来找健三，在健三审视着其容貌时写道：“岛田是个脸部自鼻子以下超长的人，加之走在路上看东西时总是张着嘴巴。因而看上去活像个傻瓜。但无论是在谁的眼里他绝对不是一个善良的傻瓜”。这时岛田突然说“喜欢李鸿章的书吗……要是喜欢我可以送给你。你还别说，要是论价格按时下的行情，它应该相当值钱吧”。这让健三想起岛田曾挂过的“藤田东湖”“伪笔”，写道：“他说要给健三的所谓李鸿章也说不定又是什么地方的什么人写的，值得怀疑。”健三也没打算要岛田的什么东西就没搭他的茬。47回，岛田走后健三琢磨着其来意觉得匪夷所思说：“实在是莫名其妙。本来彼此就是如鱼与兽一般的悬殊吗”。阿住也有同感就说：“送什么李鸿章的挂轴，……心里还说不定也许是让我们买呢，肯定”。“夫妇比李鸿章的书更需要买的东西还很多”就没把它当回事。49回，再次来访的岛田连“李鸿章的李字也未提起过”，恢复养父子关系的事更是守口如瓶；而健三已预感到岛田早晚有一天拿某种对自己不利的东西来要挟，本能地产生了一种防备的心理。健

三猜想的某种东西就是他后来无法忍受岛田贪婪的“侵蚀”而断绝关系时，实际上以100日元买回的那份“誓约”书。这一结果也如阿住猜想，只是岛田卖给健三的并不是“李鸿章的书”，而是健三自己的“誓约”书，两书的这种关联实意味深长。显然，“李鸿章的书”在这里指的是书法，而“李鸿章”所能唤起的首先应是其外交，尤其《道草》“契约”反复的性质，健三与岛田的恩怨以及彼此“鱼与兽”一般的关系，岛田对健三贪婪的“侵蚀”等自然让读者联想起中日关系史上由李鸿章签署的条约书来。而且，作品在导入“李鸿章的书”后又附与了“藤田东湖”的“伪笔”^[9]；还有作品里“金鷄勋章年金”^[10]“乃木大将”^[11]“台湾”等相关材料所描述出的时代背景，就不得不让读者考虑“李鸿章的书”的时代意义。岛田说送“李鸿章的书”心下自然是要求健三能履行其“誓约”与自己恢复养父子关系，言外之意国家间的条约书都在反复无常化，更何况是个人间的“契约”，想以此为自己毁约而开脱。而健三始终默然，这里应隐含了作者的国家观念：条约作为国家或君主之间签订的“契约”本应体现一种道义理念，应有信用和约束力；而如中日外交史上被强者翻弄的李鸿章的条约书却成了一个反复无常化的代名词，还远不如健三个人的“誓约”书有诚信、讲道义。

3

《道草》在《朝日新闻》上开始连载是1915年6月3日。同年5月25日中国被迫签署了《二十一条》的部分条款，即《民四条约》。所以，《道草》开始执笔的时间应与《民四条约》签署的时间基本上重叠。《道草》的作品时间为健三留学归国那年秋到转年初的两个多月，健三归国那年“三十六”岁，“十五六年前”与岛田断绝关系时，健三“到没到廿岁”；付给岛田养育费（赡养费）为健三“廿二岁的春天”，其“字据”日期为“明治二十一年子一月”，即1888年1月。这就是说健三归国的时间为明治三十五年，即1902年。《道草》从第一回岛田出现

开始到一〇二回养父子关系结束按故事展开的日期推算,作品时间应为1902年10月下旬到1903年1月中旬。而作者实际归国的时间为1903年1月下旬,年份上健三要早一年。1902年1月《日英同盟》签订,之后日本朝野上下充满了与俄开战的火药味儿,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养父事件实际上发生在1909年3到11月,这年秋应“满铁”^[12]邀请作者游历了“满韩”,10月26日在作者刚去过的哈尔滨火车站,与李鸿章签约而闻名的伊藤博文^[13]被杀。总之,《道草》在1902年10月下旬到转年1月中旬约两个多月的作品时间内,实际上压缩了《日英同盟》、“日俄战争”到伊藤被杀约七、八年间日本重大事件的时代背景。

阿缝的丈夫柴野享受的是“金鷄勋章年金”。阿缝病死,岛田失去了“年金”的滋润就来找健三要求恢复养父子关系。阿常的养女婿“死于战争”,养女因此享受着“抚恤金”。养女招了新婿失去了享受“抚恤金”的资格生活困难,阿常就来找健三。以上两金均开始于1890年,而“金鷄勋章年金”化是在“甲午战争”后;“抚恤金”实施以后到1902年间发生的战争应该是“甲午战争”或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战争,相关条约为《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还有“甲午战争”结束,《马关条约》签订,日本人才公开进出“台湾”。所以,作品里“乃木大将”作了“台湾总督”,“门司的叔父”去“台湾”开公司等反映的就是“甲午战争”后的这一时期。而且“门司”与下关(马关)仅隔一条河宽的关门海峡相望,也让读者自然联想起《马关条约》。另外,岛田的“特使”吉田曾是军队的后勤供应商,他常出入兵营受到了军官柴野的特别关照,柴野随军营在濑户内海一带服军役等信息也交代出了随军队大本营移动,天皇移居广岛作为大元帅坐镇指挥“甲午战争”前后的时代背景。

给养父“抚养费付讫”“字据”日期为健三“廿二岁的春天”(1888年春),断绝关系时健三“到没到廿岁”,即1885-86年。1885年是《天津条约》签订的年份。另外,为岛田的事健三到比田家,看到了“筒井政宪”^[14]的书法匾额,想起了过去比田的

相关讲解;岛田提及“李鸿章的书”时作品又附与“藤田东湖”的“伪笔”。这些19世纪中叶以来以日本“尊王攘夷”、对外缔结条约而闻名的人物的书法作品材料自然也让读者联想到“李鸿章的书”与其条约书的关联性。

4

19世纪中后期,在西洋列强东渐和清朝日趋衰落的背景下,李鸿章的外交总体上秉持了中国礼义之邦的道义理念,但在“所谓弱肉强食才是国家交往的真面目”^[15]的时代表现得妥协,因此,李鸿章与列强所签的大多是些不平等的割地赔款条约。“黑船事件”^[16]意味着西洋列强的“海啸”波及到日本岛,日本人意识到了生存的危机,朝鲜半岛就成了日本的生命线,于是日本几朝人觊觎中国大陆的野心又从日本人的意识中浮了上来,“侵蚀”中国成了其基本国策。所以,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之际,日本人也趁火打劫。千年来通过朝鲜半岛等汲取大陆的给养而发展壮大起来的邻邦日本转脸变成了中国、朝鲜的大患。从此,中日关系呈现出了“鱼与兽”般的态势,日本“侵蚀”中国、朝鲜的“痕迹”从李鸿章与日本所签署的诸条约书上体现出来。

1871年9月,伊达宗城与李鸿章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相约: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这是中日近代最初的条约,它体现了平等互利,互不侵犯的原则。然而,应日本的需求,内涵了李鸿章礼义之邦道义理念的这一条约竟成了日本吞并朝鲜及中国的祸端,“蕞尔小国”带来天大麻烦^[17]。1885年4月,伊藤博文和李鸿章签订《天津条约》约定: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今后两国均不向朝鲜派军事教官;如向朝鲜派兵时,要相互通报。由此日本获得了随时可以向朝鲜派兵的特权。1894年8月,日本利用此约发动了“甲午战争”。转年北洋水师失利,李鸿章应邀到下关与伊藤博文和谈。4月签署的《马关条约》有:中国承认朝鲜

完全独立,割让辽东半岛^[18]、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付给日本赏金两亿两等。同年,日本霸占了琉球,解决了多年的所谓“搁置争议”问题。转年,日本设立了台湾“总督府”。1900年,八国联军在北京镇压义和团,与此本无干系的日本人却充当了联军的主力。这年9月,列强与李鸿章签订了《辛丑条约》,由此,联军获得了中国赔款4亿5千万两和在中国的驻军权。

1902年,日本通过签订《日英同盟》巩固了其在中国和朝鲜的既得权益,并为“日俄战争”和出兵山东铺平了道路。1904-1905年,日本发动了“日俄战争”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日本通过《朴茨茅斯和约》和《马关条约》进一步巩固了其在朝鲜的既得权益,取代了俄国在中国的所有权益,确立了其在南“满州”的地位。1906年6月,日本成立“满州铁道株式会社”,8月,设立“关东都督府”。1910年8月,日本通过“日韩并合”吞并了朝鲜半岛。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日英同盟》报“三国干涉”之私仇,9月出兵山东,11月攻陷青岛。次年5月,日本迫使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部分条款,取代了德国在中国的一切权益,日本人在南“满州”、内蒙东部获得了几乎与中国公民同等的权利。

从《中日修好条规》起,日本通过战争与和约的反复,逐步实现着其“侵蚀”中国的宿愿,李鸿章的条约书只是反映中日“鱼与兽”关系的开始。而当时包括李鸿章在内,有道义感的人或许认为每一个条约应是问题的终结。然而,“生存欲”上升为占有欲时,日本人的胃口越来越大,其贪婪而丧失道义的行为终引火烧身祸及本土导致了漱石预言的“亡国”^[19]结局。近代中日关系也是夏目漱石一直关注的问题,作为那个时代日本少有的道义伦理作家,相关发言在文学里甚多。

5

漱石提及“李鸿章”只有晚年的《道草》,而言及《马关条约》则是早期的《少爷》^[20]。《马关条约》

签订时,漱石离开东京到四国任教。李鸿章在下关谈和期间曾遭到日本主战者的狙击,日本人暗杀使节的行为受到了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当时有报纸说:“日本人野蛮。虽战场上取得了胜利,可道德上却败给了清国。”^[21]这一事件被漱石写进了以四国为背景的《少爷》里。《少爷》里所描述的“中日谈判”具有“鸿门宴”的性质,这一认识符合“少爷”的性格,也体现了作者的道义理念。这种道义观与作者在英国留学期间从第三国看中日关系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漱石在伦敦得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伦敦消息》里写道:“支那在遭受着天子蒙尘之辱”^[22]。《辛丑条约》后,在英的日本人经常被误认为中国人受到羞辱。而漱石却在日记^[23]里写道:“我以为支那人要比日本人光彩得多,支那只是眼下不幸衰落沉沦而已,有良心的人应该感到被当成支那人比日本人荣幸才是。即便不是如此,也应该想想迄今日本曾受到过支那多少照顾”。这些文献至少表明在国家关系上漱石也是一个有道义感和良心的人。作为日本人漱石对其国民性自然有一定的了解,他当时的片断^[24]就这样写道:“人说日本人是没有留恋心的国民,数百年来风俗习惯能在转眼间打破而毫无惋惜之情,从这点看确实如此。……日本人因一时的发作可以把所有的风俗习惯扔掉,而在发现需要时还能再把它拾起来。……日本人是缺乏创造力的国民,维新前一心热衷于模仿支那,维新后又专一地模拟西洋”。这可以说是最早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论,它揭示了日本人浅薄势利、无情无义,不定型、无规则,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的民族根性,指出了现实势利是日本人缺失对事物总体把握和思辨认识能力的原因,缺乏创造力是决定日本人攀缘摄取性的根源。《日英同盟》签订后,漱石在给其岳父的信^[25]中写道:“听说日英结盟国内也非常狂癫,宛如穷人和富豪攀上了亲,……本来国际上的事与其说是道义还不如说是以利益为基础的。以个人的事比喻国家间的事深知欠妥,可国人如此狂癫实在令人不安”。信里漱石把日英结盟比作攀亲,指出日英“结亲”缔约不是为了“道义”而是

为了“利益”。他认为国家间缔约不能只顾利益，只顾利益，不顾道义实在令人“不安”。1909年10月18日，从“满韩”游历归国的漱石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满韩的文明》，对日本在“满洲”的“既得利益”也表现出了一种欣慰，而10月21开始其在同报上连载的《满韩处处》^[26]里就流露出了一种深度的“不安”。其中有他在大连参观过的“魔鬼窟”^[27]的描述：看到在那里忍辱负重、默默劳作的中国“苦力”时，不禁想起《汉楚军谈》里的“胯夫”韩信^[28]来。这一高度凝缩的镜头饱涵了作者对日本殖民政策的诅咒和警告。因为作者写这回的时候，是在他刚去过的哈尔滨车站，伊藤博文已被韩国独立运动家暗杀^[29]。其后，漱石在《门》^[30]里对去“满蒙”的日本冒险者感到忧虑，再提伊藤事件。如“阿米”听到“伊藤被暗杀的号外消息”时，追问“为什么被杀？”“为什么要去满洲？”读者都知道是因“日韩合并”而无视道义的结果。当时能在新闻小说里提出这类问题的日本人并不多，想必漱石也只能点到为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心》搁笔，主人公“先生”的自杀与“乃木大将”殉死以及明治天皇驾崩的关联性使这部作品的主题从个人道德提升到了国家道德的高度。“先生”的自杀关系到其好友“K”一个人的自杀，而在“乃木大将”所指挥过的孝忠天皇的战争中牺牲的光日本人就数以万计。同是自杀，就罪恶感深重而言“先生”与乃木有天壤之别，更何况乃木剖腹自杀是“殉死”还是“赎罪”读者可以双意理解。这一结尾的巧妙设定深化了《心》的主题，追及到了近代以来日本国家的战争罪恶及“忠皇攘夷”的问题^[31]。这年9月，日本以《日英同盟》为由出兵山东，11月初攻陷青岛，漱石在日记里对青岛总攻和陷落都作了记录，这表明了他对国家行为的关注。同年11月底，漱石在贵族子弟大学学习院讲演，提出了其独立自主、充实自我又尊重他人的“道义上的个人主义”。他强调“事实上自己既是国家主义者，也是世界主义者，同时还是个人主义者”，并明言：“国家的道德比(我的)个人主义的道德要低许多。本来国家只不过是辞令上如何而已，实际上没有什么

道义心，欺诈、诡计、无所不为”^[32]。这与《道草》里提及的“李鸿章的书”和健三的“誓约”书相关联，与《心》的主题及《文学论》里就指出的“至于以身殉国，其真意值得怀疑。国家在具体度上要比个人模糊许多，为此奉献一身太糊涂了”^[33]的认识相通，反映着漱石一贯的国家观念。在盲目地忠皇报国，以屠杀和自杀为耀，轻视众生命的日本近代，像漱石这样有知性和道义伦理感的日本人实是难能可贵的！小森阳一说：“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的支派和被支派的关系，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人权主义差别和战争的暴力问题是小说家夏目漱石自诞生开始就表现的一贯主题”^[34]。大冈升平也说：“漱石的意识有不能还原于国家、社会、权利的部分”^[35]。的确，一个与禅关联较深，一生对现实存在充满怀疑而追求一种正思维^[36]下的生存伦理，讲道义、有良心，认真思考过近代日本的作家漱石而言与同时代日本“国家、社会、权力”产生乖离是必然的。

6

在《道草》创作的这年1月，漱石发表的《玻璃窗里》^[37]传达了他关注世态的心境。其中有这样的描述应与《道草》关联：“去年欧洲开始了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何时结束难以预测，且日本也承担了这次战争的一小部分。……当我发现我的病在继续时，就想欧洲的战争恐怕也是从哪个朝代开始的继续。可是至于它是从什么地方，因什么开始，又将以怎样的曲折进行下去就不得而知了。反而羡慕那些不解“继续”一词含义的一般人来”。这里的“继续”与接下来的《道草》的结束语：“世上哪有什么能够了了的事，一旦发生过一次便会继续下去。只不过是因为它是不断变化的不同形态出现，无论是他人还是自己不得而知而已”的“继续”是相通的。前者包括了《日英同盟》、日本出兵山东、《二十一条》的内容；后者是健三拿到与养父断绝关系的新“契约”和他那份“誓约”书后，回应阿住“太好了，那个人的事总算彻底解决了”时说的。值得注意的是：阿住“那个人”的事被扩

展为“世上”的事；健三100日元买回的是他的“誓约”书，而不是“李鸿章的书”。家事、国事，天下事都在“不合理”“继续”中，没有了结的时候；“相互不应无情无义（不能不仁不义）”还只是一个理想，这应是作家漱石对人生世事的感悟。所以，记述三十多年间“契约”反复的《道草》里导入“李鸿章的书”与《心》关联“乃木大将的殉死”一样，是伦理道义作家夏目漱石国家观念的一种表现方式，其意义在于唤起一种对国家道义伦理的思考。

《道草》执笔前半年，漱石在《我的个人主义》里重提《文学论》(序)的遗憾，这表明《文学论》未能如愿一直是他的心病。事实上，漱石从伦敦回到东京起到入《朝日新闻》社、《文学论》出版的几年，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在他一生中是最重要、最艰难的几年。这一时期的心身过度劳累损害了其健康，使他经受了“修善寺大患”^[38]的起死回生不说，此后他的病则反反复复，一直“继续”到他去世。因此，回顾《文学论》的创作经历，思考“自我本位”的人生应是《道草》创作的内在因。而促使他执笔把这一内在的要求作品化的外因应该是《二十一条》。这样说就是基于《道草》的“契约”反复性质、时代背景以及作者情义相随的伦理道义观。虽然家事、国事性质不同，但在“契约”伦理、情理道义上应有等价的意义。养父来找他的1909年也是因为当时他已成名，年薪800日元。而为此他从1902年回国起经历了七、八年的艰难岁月。1909年是漱石游历“满韩”体感日本殖民地之年，尤其伊藤事件对他的震动是巨大的。而伊藤

被杀的近因应追溯到《日英同盟》、“日俄战争”，《日英同盟》是当时日本对外强硬的保障，“日俄战争”是日本近代代价惨痛、影响极大的战争，两者在漱石文学里也提及最多。也就是说1902-1909年间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在漱石都是值得回顾的一段历史，其中《日英同盟》签订后作者归国的1903年前后这段时间是一关键的起点。这些应是《道草》的主要事件及作品时间设定的原因。从小就被抛弃，后又立约“离缘”的养父子关系突然又翻了出来，经过一番周折后又以立约的形式解决，却又保不住什么时候再翻出来，如此“契约”的反复与“继续”是《道草》的主线。漱石离开东京时“甲午战争”结束，《马关条约》签订；漱石回到东京时“日俄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状态，其后到1915年战争与条约的反复仍在“继续”着。在漱石的经历中，《二十一条》《马关条约》《天津条约》等每隔十年一大条约的反复都是李鸿章条约书的反复与“继续”。所以说《二十一条》应是《道草》执笔的契机并导入“李鸿章的书”的主要原因。而表达一种生存的不条理性，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无常的感受，追求一种情理相随的道义生存理念才是《道草》的主题，“李鸿章的书”是其中体现国家的部分。而通过三十多年婚姻、钱财、养子等广义的“契约”关系反复，反映人生存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伦理的《道草》，也因导入“李鸿章的书”使其伦理主题触及到了国家，能唤起读者对一个时代的思考。由此说《道草》的传记意义不限于作家个人，也反映了一个时代。

注

- [1] 日本最初的婚姻“契约”始于激进欧化主义者森有礼。1875年以福泽谕吉为证人，森有礼与广濑常以“此契约未被废弃期间，要相敬、相爱，共守夫妻之道”的婚姻契约结婚。11年后因广濑常有了外遇，经夫妻协议撕毁“契约”，抛下2男1女而离婚。
- [2] 夏目金之助. 漱石全集第14卷[M]. 岩波书店, 1995: 120-122.
- [3] 夏目金之助. 漱石全集第16卷[M]. 岩波书店, 1995: 476-486.
- [4] 夏目金之助. 漱石全集第25卷[M]. 岩波书店, 1996: 39-40.
- [5] 从伦敦开始收集资料，回国后在东京大学任教期间编写的手稿。即《道草》里健三写的「蠅頭」「ノート」。《文学论》于1907年由大仓书店出版，成为东京大学第一个日本人英文文学讲师的第一本英文文学专著。
- [6] 江藤淳. 现代文学27[M]. 講談社, 1972: 218.
- [7] 伊藤整. 日本文学59[M]. 中央公論社, 1965: 492-494.
- [8] 「人間は平生彼らの未来ばかり望んで生きてゐるのに、其未来が咄嗟に起つたある危険のために突然塞がれて、もう己は駄目だと事が極ると、

急に眼を転じて過去を振り向くから、そこで凡ての過去の経験が一度に意識に上るのだといふんだね。その説によると」

- [9] 藤田东湖(1806-1855),江户末期水戸藩儒学者,尊王攘夷论者,著《回转诗史》等,死于江户大地震。《道草》里的“偽筆”为「白髮蒼顏万死の余、平生の豪氣未だ全くは除かず、宝刀洋夷の血を染め難し、卻て憶う常陽の旧草蘆」(石原千秋『漱石全集第十卷』[M].岩波書店,1994:349)的首句。
- [10] “金鷄”由来自于日本神话传说:神武天皇东征时,其弓上停了一只金鷄,迷惑了长髓彦军。“金鷄勋章年金”是对天皇忠勇而立立功军人的奖赏,始于1890年,“日清战争”时终生年金化。勋章因曾授予侵略亚洲战争中有功者成为“侵略的象征”,1947年废止。详见加藤文三等著《日本历史中》新日本出版社,1981年版105页。
- [11] 乃木希典(1849-1912),日本武士军人,指挥过中日甲午、日俄等侵略战争,曾为第一任“台湾总督”,学习院院长,为明治天皇“殉死”。漱石的《心》结尾有「私に乃木さんの死んだ理由が能く解らない」一句。
- [12] “南满州铁道”,以日俄战争从俄国手里获得的南满州铁路及其附属设施,1906设立的半官半民经营式的国策公司,归“满洲国”后经营范围从铁路扩展到其他产业部门,曾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据点。1945年被中国接收。
- [13] 伊藤博文(1841-1909),日本山口县人,明治政府的核心人物,日本初代首相,尊王攘夷推行者、在甲午战争实施及讲和交涉、日俄战争实施及战后对韩政策等日本的势力扩张上可谓呕心沥血,劳苦功高。1909年10月26日,因“日韩合并”在哈尔滨火车站被韩国独立运动家安重根暗杀。
- [14] 筒井政宪(1778-1859),江户末期的外交官,擅长书法,筒井家的养子,1854年曾主持签订“日俄和亲条约”,为解决日本北方日俄领土问题施展了其手腕。
- [15] 鹿野政直.福澤諭吉「対外の進退」,明治の思想[M].築摩書房,1964:159.
- [16] 美国提督远东舰队司令佩理(1794-1858)于1853-54年两次率舰到达日本,打开了日本200多年锁国之门,和日本缔结了和亲条约,因其战舰为黑色、蒸汽机冒黑烟而得名。
- [17] 董丛林.李鸿章的外交生涯[M].团结出版社,2008:115.
- [18] 迫于俄法德“三国干涉”而放弃,但追索了赔赏金。此后日本“卧薪尝胆”10年日俄战争后如愿以偿,日本通过与俄签署《朴茨茅斯和约》,以所谓“转让”“同意”的方式得到了旅顺、大连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的经营权。又十年,日本在其强大的武力背景下,通过《二十一条》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的经营权年限为九十九年。
- [19] 《三四郎》第一回在上京列车上、广田先生说日本「いくら日露戦争に勝って、一等国になっても駄目ですわね」「亡びるね」「日本より頭の中の方が広いでしょう」。三四郎觉得他有点不像日本人的感觉。漱石的「現代日本の開化」也有相同的内容。事实上,日本战败后由GHQ监管7年间,可谓“亡国”7年。
- [20] 详见『坊ちゃん』9。
- [21] 原康史.日本大戦争23[M].東京体育新聞社,1988:20.
- [22] 夏目金之助.漱石全集12卷[M].岩波書店,1994:31.
- [23] 夏目金之助.漱石全集第19卷[M].岩波書店,1995:65.
- [24] 夏目金之助.漱石全集第19卷[M].岩波書店,1995:108-109.
- [25] 夏目金之助.漱石全集22卷[M].岩波書店,1996:252.
- [26] 夏目金之助.漱石全集12卷[M].岩波書店,1994:263-267.
- [27] 日本人在日俄战争死难者的尸骨堆上建立的榨油厂。战时该地为伤员零时聚集地,其间成千上万的伤病员得不到治疗在疼痛叫喊中死去。战后几年每到夜晚仿佛还能听到冤魂呻吟一片,似乎能看到鬼影出没成群而得名。日俄战争仅日本人死亡就多达约10万人左右。
- [28] 夏目金之助.漱石全集12卷[M].岩波書店,1994:690.
- [29] 《满韩处处》第十七回,按报纸每天登载一回算,第十七回执笔应在伊藤被杀的10月26日之后。另,新近发现的1909年11月5、6两日漱石在《满洲日日新闻》上发表的随笔《满韩所感》也提到伊藤被杀事件,其中有「昨夜久し振りに寸閑を偷んで満洲日日へ何か消息を書かうと思ひ立って、筆を執りながら二三行認め出すと、伊藤公が哈爾濱で狙撃されたと云ふ号外が来た。哈爾濱は余がつい先達て見物に行つた所で、公の狙撃されたと云ふブラツトフォームは、現に一ヶ月前に余の靴の裏を押し付けた所だから、希有の兇変と云ふ事実以外に、場所の連想からくる強い刺激を頭に受けた」(《产经新闻》2013年1月7日)。
- [30] 详见『門』3-2。
- [31] 这是漱石《心》提起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迄今《心》论考的一个盲点。
- [32] 夏目金之助.漱石全集第16卷[M].岩波書店,1995:614.
- [33] 夏目金之助.漱石全集第14卷[M].岩波書店,1995:107.
- [34] 小森陽一.漱石文学と植民地主義,国文学[J].学灯社,2001(46-1):50.
- [35] 大岡昇平.漱石与国家意識,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刊行会編夏目漱石 I [M].有精堂,1979:101.

[36] 即禅宗所说的良知、良识与良心。

[37] 夏目金之助. 漱石全集12卷[M]. 岩波書店, 1994: 518-592.

[38] 1910年8月胃病初愈后在修善寺温泉疗养中再次恶化, 导致大出血, 经历了“三十分钟的死”的体验。

参考文献

夏目金之助. 漱石全集第14卷.[M]. 岩波書店, 1995.

江藤淳著. 现代文学27.[M]. 講談社, 1972.

伊藤整. 日本文学59[M]. 中央公論社, 1965.

原康史著. 日本大戦争23[M]. 東京体育新聞社, 1988.

夏目金之助. 漱石全集12卷[M]. 岩波書店, 1994.

夏目金之助. 漱石全集第19卷[M]. 岩波書店, 1995.

夏目金之助. 漱石全集22卷[M]. 岩波書店, 1996.

夏目金之助. 漱石全集第16卷[M]. 岩波書店, 1995.

小森陽一. 漱石文学と植民地主義, 国文学[J]. 学灯社, 2001.

大岡昇平. 漱石と国家意識, 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刊行会編夏目漱石 I [M]. 有精堂, 1979.

夏目金之助. 漱石全集10卷[M]. 岩波書店, 1994.

董丛林. 李鸿章的外交生涯[M]. 团结出版社, 2008.

作者简介: 胡兴荣(1963—) 男 汉族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日本文学研究

联系方式: E-mail: kouei.happy@163.com

The Meaning of “Li Hongzhang’s Calligraphy” in Natsume Sōseki’s *Michikusa*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and investigates the property of “contract,” its background and the concept of nation in *Michikusa*, written by Natsume Sōseki. This illust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ract” in *Michikusa* and “Li Hongzhang’s calligraphy.”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Li Hongzhang’s calligraphy” in *Michikusa* is not a pure writing concept, but implies Li Hongzhang’s “treaty calligraphy,” which reflects the writer’s consistent concept of nation, for the sake of arousing national moral and justice principles. Previous studies indicated that *Michikusa* is not only the biography of the author himself, but also the diary of his family, expressing the writer’s recognition of humanity and understanding of survival. Its main theme reflects the age in which it was written.

Keywords: Natsume Sōseki; *Michikusa*; contract moral principles; Li Hongzhang’s calligraphy; morality and justice

Author’s Information

Hu Xingrong (Male) Year of Birth: 1963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Japanese Literature

E-mail: kouei.happy@163.com